

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生命力体现与实践品格*

——来自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数据考量

陈经伟 姜能鹏

〔摘要〕价值转形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核心内容之一。然而,这一原创性理论从其创建开始就有质疑甚至反对声音。本文通过重新审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突破传统静态分析局限,构建价值转形动态模型,再一次证明该理论是不可质疑的经济学内容;同时,将价值转形理论与现实经济相结合,发现价值转形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中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问题以及经济增长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1998-2009年期间产业结构数据进行考量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现象完全符合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逻辑,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品格”特性。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它可以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价值转形 利润率 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

JEL分类号:B14 D43 D46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那么,价值转形理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问题之一,从其创建开始就备受争议,作为一名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有必要且必须运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对该理论问题进行探究。

多年来,国内学者针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探讨,主要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传导机制以及是否符合现实经济社会等。本文则另辟蹊径,构建相应的动态价值转形模型进行理论逻辑推理,并应用中国转型期间产业结构数据进行验证,其结果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实践品格和当代生命力体现。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重新审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分析框架和流程,突破传统静态分析的局限,建立长期动态转形经济分析模型,从数学逻辑分析转形理论;(2)将转形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为中国的产业间利润率差异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3)在产业结构演化的基础之上,拓展性地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从产业间利润率差异性的角度论证产业结构优化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

* 陈经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姜能鹏,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百年之争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创造性地解决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和价格由劳动价值决定”之间矛盾的理论问题。虽然马克思针对价值转形问题的论证,不论是在理论内在逻辑方面还是在方法运用方面,都是严谨和妥当且受到众多学者支持的,但同时受到一些不怀好意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反对和批评,价值转形经济问题的争论由此开始,关于马克思价值转形的理论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最初,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计量单位、投入品和产出品生产价格是否同时决定、“总计一致二”命题是否成立等问题。随后,争论的焦点发展到:劳动价值论对生产价格决定是否冗余、转形是否存在“历史性”的问题、价值利润率和价格利润率是否相等和价值转形是否是“伪命题”等问题,甚至发展到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整个体系是否科学提出质疑。也就是说,从庞巴维克对生产价格理论的批判,到博特凯维茨站在维护价值转形理论的基础之上第一次运用数学的逻辑对价值转形理论进行研究,再到“蒙昧主义”将转形理论奉为信条,针对这一理论的论战已持续上百年,迄今为止,价值转形理论在理论界仍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也就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不久,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就发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论文对马克思进行攻击,并认为“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柏林大学的统计学教授博特凯维茨则用代数表达式取代马克思所用的数例,并构建三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对转形问题进行肯定性研究。到20世纪初,西方理论界针对转形问题的研究开始转向数学模型分析。Bortkiewicz^①利用数学逻辑对价值转形理论进行阐释,这种解法将马克思生产理论与转形理论结合,通过对价值转形基本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投入品和产出品生产价格是可以同时形成的。Meek^②进一步对价值转形模型做了修正,认为如果通过剩余价值总和与利润总和相等建立“不变性方程”,则价值转形理论不成立。另外,斯威齐^③的研究第一次提出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不相等是由于计量单位方面出了问题。随后,迪金森^④和多布^⑤提出价值以劳动量测定,而价格以货币量测定,只要价格比率确定,具体转形步骤是可行的。

在20世纪60年代,斯拉法^⑥从商品生产的物质关系出发研究商品的相对价格。自此之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商品生产的物质关系与价值转形的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Samuelson^⑦的相关研究,他们以批判为基调,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多余的”,其简单逻辑是生产价格独立于价值而存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Dumenil等为代表的学者在批判“新李嘉图主义”基础上提出其相应的新解主义,新解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量转化为劳动时间量,论证并说明价值体系与生产价格

① Bortkiewicz (1906):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J. Kahane (tran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No. 2, 5-60.

② Meek (1956): "Some no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Econ. J. March, 66, 94-107, printed in Meek, R.,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67, pp. 143-157.

③ 保罗·斯威齐(1997)《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④ 迪金森《评米克“价值转形理论的若干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44期,第28-29页。

⑤ 多布(1982):《对转形问题的补充评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44期,第29页。

⑥ 斯拉法(1993):《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

⑦ Samuelson, P. (1957): "Wages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 884-912.

体系是可以转化的,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正确性。Morishima 和 Catephores 认为价值转形问题是一个逻辑分析问题,价格和生产价格是可供选择的逻辑分析工具,而不是历史上的转形问题。森岛通夫^①运用马尔科夫矩阵的迭代法研究价值转形问题,解释了投入品和产出品在生产价格决定是有时间差异性的。斯蒂德曼^②将投入和产出的生产价格看作共同决定因素,并认为利润率是内生的,他研究的结论和观点与 Samuelson 基本一致。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研究也很丰富。魏坝^③指出 Bortkiewicz 混淆了预付总资本与耗费资本之间的关系;张忠任^④认为,价值和生产价格无论是以劳动时间描述还是以货币描述,价值转形都是存在的;丁堡骏^⑤认为生产价格的本质就是平均价值,所以两者之间的转化也是存在的;白暴力^⑥认为货币本身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会发生偏离,价值与生产价格都应该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冯金华^⑦运用再生产实现条件论证了在一定的技术假定条件下“总计一致二命题”同时成立,他以两个总量相等为基础的论证价值转形问题是个“伪命题”。丁堡骏^⑧指出研究转形问题不能混淆价值转化和价值实现,转形问题是一个真实的经济学命题。冯金华又进一步从动态的角度和偏离系数法对价值转形是伪命题做出论证。

总的来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对马克思价值转形持质疑或反对态度和持肯定态度不分上下,而国内学者一般以肯定态度给出解读或答案。之所以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长达百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很多学者并没有走出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古典经济学将价值理论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但它始终无法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价值和生产价格,导致其理论充满很多的矛盾。随后,虽然康拉德·施密特和彼·法尔曼等人对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矛盾提供了相应的解释,但解答并不完整,也无法解决一些经济学基本命题。而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虽然根源于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不确定性,但该理论已经走出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一直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价值转形理论出现才充分的解决了这些矛盾,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取得了一些成就”^⑨。

其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中,有一些人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主要集中于设定前提假设和数学模型推导。这一方面会造成不同的学者对价值转形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的理解差异,其研究结论也会产生有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不同的学者对命题所论述的经济现象观察和解读有差异,数学模型构建也会有所不同,其推导的结论也自然不同。

其三,有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研究价值转形问题时往往局限于静态研究而缺乏动态分析,局限于局部分析而缺乏全局分析,局限于阶段性的分析而缺乏长期的分析,同时还缺乏现实数据验证研究步骤,从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是相反的。

面对这些争论或者批判的声音,无视或者放之任之都是不可取的。本文一方面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清晰的价值转形流程,回归马克思理论分析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突破传统静态分析的局限和拓展转形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构建相应的动态转

① 张忠任(2004):《百年难解的破解》,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② 杨·斯蒂德曼(1991):《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第39页。

③ 魏坝(1986):《再谈关于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第23-32页。

④ 张忠任(2004):《百年难解的破解》,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⑤ 丁堡骏(2005):《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01页。

⑥ 白暴力(2006):《价值转形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第59-60,92-98页。

⑦ 冯金华(2008):《价值转形:一个伪命题》,《经济评论》,第3期,第83-89页。

⑧ 丁堡骏(2009):《一个真实的经济学命题和一个伪证的学术否定》,《当代经济研究》,第3期,第1-9页。

⑨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6页。

形模型,从动态角度和长期分析维度研究转形理论。本文不仅仅与中国实践情况相结合,探究价值转形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一步拓展价值转形理论的适用范围,为当代新背景下研究转形理论提供新的方向;同时,以价值转形理论为基础探索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而为我们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下一步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

二、马克思价值转形过程与流程分析

所谓“转形”就是指商品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一种经济现象。马克思转形理论是指价值理论向生产价格理论转化的理论,其核心的问题是在一个商品价值已知的体系中,价值体系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体系。一般认为,正因为李嘉图等古典政治学家将价值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生产领域以及这一问题上存在着“科学上的不完备性”,无法很好解释这一经济现象才导致其解体的。

马克思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坚持价值的来源是劳动观点,并且将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历史特点联系起来。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了抽象分析法——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而展开,体现为“具体”与“抽象”以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①。按照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并非直接作用于现实经济关系,它是通过几个“中介环节”和几个“具体步骤”及其相应的“转形过程”才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描述了一个具体的转形方案:“一个商品的价格,如等于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的那一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②。随着资本主义各部门的发展,各部门之间由于资本构成、资本利用效率和资本周转速度的差异,利润率在各部门之间会出现差异^③。但是,由于社会的竞争强度不断增强,资本会在各部门之间流动,而且,流动的方向是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这种流动最终会使得部门之间的利润率逐渐趋于一致。此时,社会各部门不再以价值,而是以生产价格作为销售商品的基础。完成了从价值体系向生产价格体系转化的过程,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先说明了价值及其相关概念,才能说明生产价格及其相关概念”。本质上,价值规律与生产价格规律是一致的,建立价值与生产价格的转化关系正是解释其统一的关键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其转形理论受到西方诸多经济学者质疑的,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具体转形步骤上。因此,本文基于《资本论》价值转形过程的理论阐述^④,同时借鉴程恩富和马艳^⑤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解读,将价值体系与生产价格体系转化的过程总结为六个转化关系,并构建了一个清晰的价值转形流程图来描述其“转形过程”(如图1):资本转化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其中,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是价值转形过程的最重要环节。同时,马克思也充分认识到平均利润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

① 这一方法在《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中充分体现。

②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84页。

③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77页。

④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36-177页。

⑤ 程恩富、马艳(2012):《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3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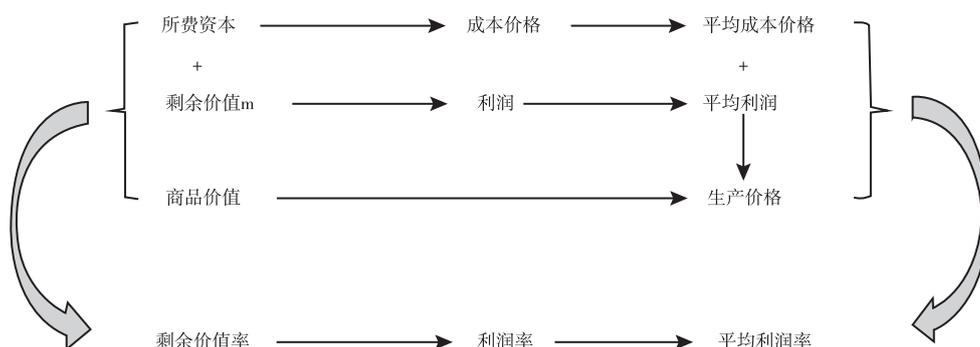


图1 价值与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

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①。这个转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各部门之间激烈竞争,通过各部门竞争机制推动资本的流动,使得各部门之间的资本利润率差异不断缩小,最终达到一致,各部门的利润率转化为社会总体的平均利润率。但是,当部门之间利润率实现平均化,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得以实现,即生产价格的形成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同时完成的。

同时,本文根据上述马克思价值转形流程图及逻辑结构分析,构建了一个数量关系模型,用于解释价值转形理论的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转化过程:

$$(c_1 + v_1) \cdot (1 + r) = p_1 \quad (1)$$

$$(c_2 + v_2) \cdot (1 + r) = p_2 \quad (2)$$

.....

$$(c_n + v_n) \cdot (1 + r) = p_n \quad (3)$$

$$r = \frac{\sum m_i}{\sum (c_i + v_i)} \quad (4)$$

其中, c_i 、 v_i 、 m_i 、 p_i 第*i*个部门按价值计算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和生产价格, r 表示平均利润率。(1)-(3)表示不同的部门面临相同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这个社会平均利润率是由剩余价值是经过利润的传导得到的,见(4)。最终,价值体系实现了向生产价格体系转化的过程。

进一步,通过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数理方法更细致的解读,发现最初各部门之间利润率是不同的,但逐利的资本会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动到利润率高的部门,而资本的流动使得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共同构成的生产资本总额转化为平均成本价格,与此同时,各部门的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的传导转化为平均利润。最终,由生产资本总额与剩余价值共同决定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由平均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共同决定的生产价格。由于利润率平均化得以实现,导致各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即 $P = W$,即生产价格等于价值总和。价值体系实现了向生产价格体系转化的过程,符合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

总之,西方经济学针对价值理论的研究往往是建立在斯密的交换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是不可能具有交换价值的,而且商品与商品的交换也就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所以,斯密的交换价值理论并没有阐释清楚价值的本质。马克思批评其:“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

^①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通过分析式(12),发现生产价格总和减去价值总和等于不变要素投入与价值的差额,也就是无法证明问题(2)。它一方面说明了,从数量逻辑上讲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是没有被否定的,同时从另一方面解释了生产资料在不同部门的资本构成与社会平均资本构成之间存在差额现实问题。简言之,这个差额是由劳动创造的,它更加符合马克思价值理论基本内容和逻辑分析了。

四、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动态模型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转化理论时,发现利润率的平均化首先是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实现的,但由于商业部门的特殊性存在,商业部门会逐渐地从产业部门中独立出来,商业部门等非生产性部门同样会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商业部门内部的资本也会在部门之间流动,最终获得平均利润。马克思把这种形式称为“完全形态的生产价格”^①。但是,现实存在的社会并不符合这种状态,存在着垄断部门,这必然会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进而阻碍了平均利润率的实现,由此形成的生产价格就不是完全形态的生产价格,而是垄断生产价格。由于现实经济社会中(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国家或地区)并不符合这种完全形态的条件,更符合垄断竞争的状态。为了刻画一种更贴近现实中价值转化所处的经济社会状态,凝炼出最本质的要素,本文采取抽象分析法,主要研究垄断生产价格的动态模型,最终揭示价值转化的本质。

假定社会中存在两类部门,一类是垄断部门,另一类是竞争部门。为方便分析,这里同时假定垄断部门是完全垄断的并且只存在一家企业,竞争部门的资本无法进入垄断部门,但是垄断部门的资本可以进入竞争部门。由于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只要垄断部门的资本进入竞争部门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垄断优势实现的主要手段是垄断价格,包括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

首先,在垄断部门出现之前,各部门的生产价格符合下列条件:

$$p_i = (1 + r^0)k_i \quad (13)$$

$$r^0 = \frac{\sum_{i=1}^{n+m} \pi_i}{\sum_{i=1}^{n+m} k_i} = \pi_i/k_i \quad (14)$$

式(13)和式(14)中, p_i 、 r^0 、 k_i 、 π_i 分别表示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并且可以得到价值转形前的利润总和为 $\sum_{i=1}^n \pi_i$ 。

当垄断部门的资本进入竞争部门后,垄断部门利用垄断优势,低价购进生产资料,而高价卖出产品,在此过程中,垄断部门必然会占有原归属于竞争部门的利润,导致竞争部门的总利润减少。

(1)由于垄断部门以垄断低价购买生产资料,导致竞争部门较少的利润为:

$$\Delta\pi_1 = \sum_{i=1+n}^{n+m} (c_i - c_i^m) \quad (15)$$

式(15)中, c_i 为不变成本。

(2)由于垄断部门以垄断高价将产品销售给竞争部门,导致竞争部门减少的利润为:

$$\Delta\pi_2 = \sum_{i=1+n}^{n+m} (p_i^m - p_i) \quad (16)$$

综合上述两点,竞争部门减少的利润总和为:

$$\Delta\pi = \sum_{i=1+n}^{n+m} [(c_i - c_i^m) + (p_i^m - p_i)] \quad (17)$$

因此,垄断部门进入后,竞争部门的生产价格为:

$$p_i^c = (1 + r^0)k_i^c \quad (18)$$

^①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77页。

$$r^c = \sum_{i=1}^{n+m} \pi_i - \Delta\pi / \sum_{i=1}^{n+m} k_i = \pi_i / k_i \quad (19)$$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垄断部门的资本进入竞争部门的资本后,由于垄断部门可以利用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获得超额利润,导致生产价格转化为垄断生产价格。同时,原归属于竞争部门的利润被垄断部门占有,导致竞争部门的利润下降,形成的平均利润也会下降。

通过分析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并构建动态模型,发现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差异会引起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同时,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会使得资本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开辟新的领域。当新产业出现在垄断竞争的社会中时,资本的流动规律表现为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行业。当商业资本等非生产性资本脱离于生产资本后,实体产业的资本又会流向虚拟产业。由此可见,动态价值转形理论充分阐述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正是利润率。

本文的动态价值转形理论分析,不仅放松了传统研究中诸多的假设条件,将以往对于转形问题的研究纳入到动态转形框架中,而且也为人均利润率变动规律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等经济规律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

五、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动态模型框架下的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分析

为了证明马克思价值转化理论能够具体化于实践,本文利用我国1998-2009年产业结构演变统计数据,在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框架下分析我国现实经济中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问题以及经济增长问题。进一步论证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完全符合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阐述。

(一) 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及动态模型构建,发现利润率的差异会导致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动到利润率高的部门,从传统部门流动到新兴部门,从实体部门流动到虚拟部门。最终,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导致产业结构的演变。为深入分析这一问题,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ln scale_{jt} = & \beta_0 + \beta_1 gapprofit_{jt} + \beta_2 \ln labor_{jt} + \beta_3 \ln capital_{jt} + \beta_4 \ln currency_{jt} \\ & + \beta_5 \ln flowcost_{jt} + v_j + \mu_t + \varepsilon_{jt} \end{aligned} \quad (20)$$

式(20)中, j 表示产业, t 表示年份, $\ln scale_{j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规模; $gapprofit_{jt}$ 为主解释变量,表示产业间的利润率差异; $\ln labor_{jt}$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生产性劳动, $\ln capital_{jt}$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生产型资本, $\ln currency_{jt}$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流通时间, $\ln flowcost_{jt}$ 表示资本流通成本, v_j 表示产业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各个产业不随时间变动的特征, μ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外部环境变化对各产业的共同影响, μ_t 为随机误差项。此式用以分析产业间利润差异对产业规模的影响,如经实证检验发现,产业间利润率差异会影响产业规模,说明产业间利润率的差异促进资本的流动,即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在中国具有适用性。

相关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①。将二者联系起来,发现利润率差异使得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为充分验证这一问题,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ln output_{jt} = & \beta_0 + \beta_1 gapscale_{jt} + \beta_2 \ln labor_{jt} + \beta_3 \ln capital_{jt} + \beta_4 \ln currency_{jt} \\ & + \beta_5 \ln flowcost_{jt} + v_j + \mu_t + \varepsilon_{jt} \end{aligned} \quad (21)$$

^① 刘灿、韩文龙(2013):《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趋势与经济周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述评》,《经济动态》,第3期;刘伟、张辉(2008):《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第11期;余子鹏、王今朝(2014):《科技投入、结构演变与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问题》,第11期。

式(21)中, j 表示产业, t 表示年份, $\ln output_{jt}$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工业总产值; $gapscale_{jt}$ 为主解释变量, 表示产业间的规模差异; $\ln labor_{jt}$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生产性劳动, $\ln capital_{jt}$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生产型资本, $\ln currency_{jt}$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流通时间, $\ln flowcost_{jt}$ 表示资本流通成本, v_j 表示产业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各个产业不随时间变动的特征, μ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外部环境变化对各产业的共同影响, μ_{jt} 为随机误差项。此式用以分析产业间规模差异对产业总产值的影响, 如将式(20)和式(21)联系起来, 则在检验价值转形理论具有中国生命力的基础上拓展性研究产业结构演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 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产业分类标准。式(20)中 $\ln scale_{jt}$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规模, 通过将产业内各企业的规模加总得到; $gapprofit_{jt}$ 表示产业间的利润率差异, 由各产业利润减去各产业中最低利润率得到, 而利润率 = 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成本计算而得, 其中的利润总额和主营业务成本通过企业数据加总得到。式(21)中 $\ln output_{jt}$ 表示产业 j 在 t 年的工业总产值, 通过将产业内各企业工业总产值加总得到; $gaps_{jt}$ 表示产业间规模差异, 由各产业规模减去最低产业规模得到。

控制变量主要根据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分析过程, 充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适用性进行选取:

(1) 马克思认为, “不是所有劳动都创造价值, 只有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生产劳动主要表现为直接、间接地通过体力劳动生产物质产品。”本文选取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作为生产性劳动的替代变量并进行控制。

(2) 马克思认为, “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 所以很清楚, 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 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本文选取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作为生产性资本的替代变量并进行控制。

(3) 马克思认为,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 即贸易, 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 但是, “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 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 或者说, 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 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 更进一步强调, “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 资本的职能就越大, 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 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但是现有数据库并未提供关于商品流通时间的信息, 考虑到流通时间是流通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本文选取产品销售成本作为流通成本的代理变量并进行控制。

(4) 马克思认为, “不同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不同, 利润率就不同, 这必然引起部门之间的竞争”, “部门之间的竞争通过资本的转移来实现”。因此, 资本在不同部门自由流动是价值转形, 平均利润形成的关键所在。虽然马克思在考察价值转形、平均利润形成的时候, 是假设社会资本在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是无障碍流通的, 是可以自由转换的。但是现实经济中行业壁垒、部门垄断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 在考察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时, 应充分考虑市场不充分这一重要因素。本文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衡量资本在部门间流动成本的替代变量并进行控制。

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利用样本企业提交的季报和年报汇总而得, 样本范围为年销售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全部工业企业以及全部国有工业企业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了该数据库 1998—2009 年间的数据库, 共超过 400 万个观测值, 包含样本企业数量由 1998 年的 16 万家至 2009 年的 32 万家不等。本文参照既往文献处理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 (1) 删除部分观测值为负的样本, 如删除总收入、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总销售额、中间产品价值、出口额中任一项为负的观测值; (2) 删除了存在遗漏变量的观测值, 如删除中间投入品合计、工业总产值和资产合计等缺失的观测值; (3) 删除了企业规模较小的观测值, 如从业人员数小于 10 的观测值。为使数据更加平滑, 笔者对上述数据中的缺失值根据其平均变化率计算得出, 并取对数处理。

(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通过分析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动态模型,发现产业间利润率差异会引致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流动到利润率较高的行业。那么,现实经济运行状态是否符合该理论的描述?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动态模型在中国是否具有生命力?笔者将进一步借助实证分析利用中国产业面板数据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

表1所示为中国产业间利润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第(1)列中产业间利润率差异对产业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122并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间利润率差异会显著提升产业规模,即产业利润率越高产业规模越大。其作用机制在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得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将资本投入到利润率更高的产业中,产业间利润率差异越大资本追寻超额利润的动机越强,资本流动规模更高,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内资本增长越快,其规模越大。符合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动态模型描述。

由于本文所采用数据是面板数据,需要进行方差分析。基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笔者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者中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1第(2)列所示,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所得的产业间利润率差异对产业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114并在5%水平显著,说明产业间利润率差异会显著提升产业规模,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

通过对产业规模和产业间利润差异这两个变量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自选择问题,也就是说,既有可能是产业利润率高才导致其规模大,又有可能是由于规模经济使得规模大的产业利润率高,这一问题可能导致回归模型亦存在内生性,使得估计结果有偏或者不一致。Blundell和Bond^①提出的系统GMM方法融合了差分GMM和水平GMM,既可有效规避差分GMM可能产生的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亦能在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的情况下实现比水平GMM更有效率的估计。如表1第(3)列所示,采用自回归检验(AR)用以检测扰动序列的相关性,并以Hansen检验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其中AR(1)的P值小于0.05,AR(2)的P值大于0.1,表明模型扰动项之间不存在二阶或更高阶的序列自相关。Hansen检验的P值大于0.1,表明模型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因此,自回归检验和Hansen检验证明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产业间利润率差异对产业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104并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间利润率差异会显著提升产业规模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即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动态模型在中国具有生命力。

表1 产业间利润率差异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VARS	(1)	(2)	(3)
	OLS	FE	系统 GMM
<i>L. Insacle</i>			0.957*** (14.90)
<i>gapprofit</i>	0.122** (2.22)	0.114** (1.97)	0.104* (1.81)
<i>lnlabor</i>	1.322** (2.43)	0.888** (2.48)	0.953* (1.85)
<i>lncapital</i>	0.164* (1.87)	0.0839* (1.74)	0.0524 (0.09)

^① Blundell, R. and S. Bond (1999): "GMM Estimation with Persistent Panel Data: an Application to Production Functions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Econometric Reviews*, 3,21-340.

续表

VARs	(1)	(2)	(3)
	OLS	FE	系统 GMM
<i>lncurrency</i>	-0.716*** (-2.63)	-0.298*** (-5.81)	-0.225** (-2.24)
<i>lnflowcost</i>	-0.0516 (-0.98)	-0.188** (-2.33)	0.112 (0.5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Cons	1.772 (0.73)	-3.407 (-1.07)	1.666 (0.55)
N	348	348	348
R ²	0.720	0.798	0.685
Hansen Test-P			0.366
AR(1) - P			0.002
AR(2) - P			0.384

注:括号内系数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考虑到产业间的利润率差异引致的资本流动是一个动态过程,可能具有时滞效应,那么这一过程的时滞时间对于政府制定并推行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对产业间利润率差异所引致资本流动从而促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的调整时间进行研究。表2所示为产业间利润率差异对产业结构调整の時滞影响实证结果,通过比较第(1)-(3)列中产业间利润率差异对产业规模的影响系数发现,滞后2期的系数最大并且滞后3期的结果不显著,说明产业间利润率差异导致资本从利润率高的产业流动到利润率低的产业这一过程在滞后一年就会开始,并在滞后两年内完成,两年后这一作用消失,即产业间利润差异引致资本流动从而改善产业结构的作用时效为两年。

表2 产业间利润率差异对产业结构调整の時滞影响

VARs	(1)	(2)	(3)
	OLS 滞后1期	OLS 滞后2期	OLS 滞后3期
<i>gapprofit</i>	0.166** (2.04)	0.230** (2.48)	0.120 (0.95)
<i>lnlabor</i>	0.936*** (5.40)	0.349** (2.02)	0.879*** (2.60)
<i>lncapital</i>	-0.165 (-1.19)	0.0192 (0.17)	-0.150 (-0.87)
<i>lncurrency</i>	-1.212* (-1.87)	1.011 (0.90)	1.320 (0.65)
<i>lnflowcost</i>	-0.155* (-1.69)	-0.183* (-1.92)	-1.320* (-1.65)

续表

VARs	(1)	(2)	(3)
	OLS 滞后 1 期	OLS 滞后 2 期	OLS 滞后 3 期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Cons	2.153 (0.88)	-3.702 (-1.15)	1.024 (0.34)
N	319	290	261
R ²	0.668	0.732	0.756

注:括号内系数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利润率差异引导追求超额利润的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流动到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必然促进社会平均利润率上升,进而引致社会总产出增长,社会总产出可以看作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这一过程说明利润率差异通过资本流动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状态是否符合这一理论的分析?本文使用中国 1998-2009 年产业面板数据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动态模型进行拓展性研究,验证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在中国的“生命力”。表 3 为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第(1)列中产业规模差异对工业总产出的影响系数为 0.118,并在 5% 水平显著,说明产业结构优化演变会显著促进工业总产出增长,即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本文所采用数据是面板数据,需要进行方差分析。基于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笔者同样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者中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第(2)列中产业规模差异对工业总产出的影响系数为 0.030,并在 1% 水平显著,同样说明产业结构优化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产业间规模差异与工业总产出之间存在自选择问题,既可能是工业总产出高的行业会促进其规模扩大,也可能产业规模大才得以实现更高的产业总产出。自选择问题会导致回归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使得回归结果不一致或有偏。本文同样使用系统 GMM,以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以期有效规避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表 3 第(3)列为系统 GMM 模型的估计结果,自回归检验和 Hansen 检验证明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产业规模差异对工业总产出的影响系数为 0.120 并在 1% 水平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差异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具有稳定性。

表 3 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VARs	(1)	(2)	(3)
	OLS	FE	系统 GMM
<i>L. lnoutput</i>			0.931*** (13.25)
<i>gapscale</i>	0.118** (2.04)	0.030* (1.80)	0.120* (1.75)
<i>lnlabor</i>	0.183*** (4.55)	0.146*** (4.21)	0.109** (2.23)
<i>lncapital</i>	0.313*** (2.94)	0.301* (1.68)	0.265* (1.83)

续表

VARs	(1)	(2)	(3)
	OLS	FE	系统 GMM
<i>Incurrecy</i>	-1.243 (-1.35)	-1.352 (-0.85)	-1.251 (-0.55)
<i>lnflowcost</i>	-0.134* (-1.71)	-0.163* (-1.82)	1.310* (1.68)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Cons	0.563 (0.68)	-1.634 (-1.26)	1.874** (2.34)
N	348	348	348
R ²	0.586	0.512	0.483
Hansen Test-P			0.358
AR(1)-P			0.004
AR(2)-P			0.465

注:括号内系数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通过对利润率差异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以及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证明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两个核心问题的正确性:(1)利润率的差异使得资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集聚,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变;(2)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上升,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这两个核心问题的正确性,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根据计量结果,说明三者关系很显著。

通过在动态转形模型基础上运用中国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动态价值转形模型充分解释了利润率变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以商业部门为代表的非生产性职能部门利润率实现平均化后,生产价格转化为完全形态的生产价格。由于垄断部门获得超额利润,生产价格进一步转化为垄断生产价格。商业部门和垄断部门的加入会加速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进而通过提高剩余价值总和来增加平均利润率。资本的内在动因是对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追逐,推动产业部门进行创新,开辟新的领域,导致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流动到利润率较高的行业,符合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由此可见,动态价值转形理论完整地阐述了产业间利润率差异的原因,以及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和集聚,最终社会总体平均利润的提高促进社会剩余价值总额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六、结论性评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同时,“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①。然而,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重要构成部分的价值转形理论,在上百年时间里,不断

^①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受到一些对马克思理论理解不深、理解不透甚至错误认识的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攻击,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运用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理论方法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维护的同时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反击。

本文通过构建价值转形流程的结构模型、关系模型和动态价值转形模型等,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是不可质疑的经济学理论内容,它具有“强大生命力”体现;通过对中国1998-2009年期间产业结构数据进行考量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经济现状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逻辑,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品格”特性。同时,本文在继承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基本观点、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从以下几点对该理论进行传承和延伸:

第一,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动态模型解释了平均利润率变动的原因。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二:一是各部门利润率的大小。即部门利润率主要由技术水平和生产组织结构决定;二是社会资本的分配状况。这也意味着,中国应着眼于全球经济体系考察,加快资本的部门流动,引导资本向高利润率部门流动,从而引致中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我们在模型分析中加入垄断部门后,发现垄断部门可以利用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获得超额利润,使得竞争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因此,我们政策决策过程中,应考虑到目前社会并非完全竞争的状态,而通过相应的规制手段对这些部门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二,根据动态价值转形理论对平均利润率变动的解释,发现在平均利润率变动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资本在部门之间的流动,而资本的流动会使得产业结构发生演变。由于资本总是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动到高生产率部门,从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流动。通过研究利润率差异对产业结果调整的时滞效应发现,利润率差异引导的资本流动效应会持续两年。

第三,资本在高利润率产业的集聚会使得社会平均利润提高,并且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两种有利于增加社会总体剩余价值的变化必然会促进总增加值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①而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已经充分阐述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及演变过程机理,因此,它完全可以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提供实践指导。同时,为加快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解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完善以下几点政策内容:

1.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活力

根据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部门间的资本加速流动引致资本配置于高利润率部门,从而促进中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最终实现经济增长。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以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活力”等内容。习近平主席的论断,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在我国新时代条件下充分运用,另一方面说明了在实践中利润率在优化产业结构过程中确实起到巨大作用。由于技术水平是决定利润率重要因素,因此,提升技术进而提升利润率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2. 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力度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而根据价值转形理论,商品的价值体系要转化为生产价格体系,剩余价值率要转化为平均利润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会直接决定了剩余价值率,进而影响社会平均利润率。只有平均利润率不断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虽然我国由于老龄化问题导致“人口红利”下降,我国仍然是劳动力大国。但是,劳动力素质不高成为制约因素。从这一点出发,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基础;另

^①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方面,消除妨碍人才流动的壁垒,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3. 完善资本流动机制,降低资本约束

根据价值转形理论,价值体系转化为生产价格体系以及利润率差异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变得以实现,是建立在资本可以有效流动的基础之上。但是,我国的资本约束仍然存在,资本并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价值转形过程可能无法顺利实现。所以,为了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得以实现以及社会平均生产率得以提高,应该建立相应的保障资本顺畅流动的机制。

参考文献

- 白暴力(2006):《价值转形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
- 程恩富、马艳(2012):《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迪金森,H(1982):《评米克“价值转形理论的若干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44期。
- 丁堡骏(2005):《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经济科学出版社。
- 丁堡骏(2009):《一个真实的经济学命题和一个伪证的学术否定》,《当代经济研究》,第3期。
- 多布,M(1982):《对转形问题的补充评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44期。
- 冯金华(2008):《价值转形:一个伪命题》,《经济评论》,第3期。
- 刘灿、韩文龙(2013):《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趋势与经济周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述评》,《经济学动态》,第3期。
- 刘伟、张辉(2008):《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第11期。
-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 斯蒂德曼,杨(1991):《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 斯拉法(1993):《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
- 斯威齐,保罗(1997):《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
- 魏坝(1986):《再谈关于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
- 谢千里、罗斯基、张轶凡(2008):《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3期。
- 余子鹏、王今朝(2014):《科技投入、结构演变与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问题》,第11期。
- 张忠任(2004):《百年难解的破解》,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 Blundell, R. and S. Bond (1999): "GMM Estimation with Persistent Panel Data: an Application to Production Functions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Econometric Reviews*, 3, 21-340.
- Bortkiewicz, L. (1906):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Kahane, J. (tran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No. 2, 5-60.
- Foley, D. (1982): "The Value of Money, the Value of Labor Power, 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 2, 37-47.
- Meek, R. (1956): "Some No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Economic Journal*, 66, 94-107.
- Morishima, M. and G. Catephores (1975): "Is There an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Problem'?", *Economic Journal*, 85, 309-328.
- Samuelson, P. (1957): "Wages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 884-912.

(责任编辑:罗 滢)